

《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与伏尔泰的实用主义探究

The Ethical Writing in Voltaire's *The Orphan of China* and an Exploration of His Pragmatism

唐 果 (Tang Guo)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伏尔泰《中国孤儿》伦理书写的解读,探讨其如何在法国启蒙背景下,通过儒家元素映射并审视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张力。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利用儒家伦理解构善恶对立、情理之争、专制利他之辩、悲喜两轮的二元论,提出开明君主理念。通过塑造“成吉思汗”一角,展现道德在引导君主推进文化艺术发展和理念革新中的作用。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框架下,本文旨在分析伏尔泰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及其在政治启蒙中的实用主义立场,揭示跨文化叙事中的伦理观念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孤儿》; 儒家伦理; 开明专制; 二元解构; 实用主义

作者简介: 唐果,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国18世纪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为2023年法国驻华大使馆人文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异域风情到美学生成:1692-1759年法国与英国戏剧中的中国风”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Writing in Voltaire's *The Orphan of China* and an Exploration of His Pragmatis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how Voltaire uses Confucian principles in *The Orphan of China* to scrutinize the tens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n his adaptation of *The Orphan of Zhao*, Voltaire utilizes Confucian ethics to deconstruct binary oppositions such as good versus evil, emotion versus reason, absolutism versus altruism, and tragedy versus comedy, resulting in his concept of the enlightened absolutism. In characterizing “Genghis Khan”, this play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morality in guiding a monarch to foster cultural, artistic, and political-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Se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analyzes Voltaire'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his pragmatic approach to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It reveals the ethical perspectives embedded in cross-cultural narra-

tives and their impact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The Orphan of China*; confucian ethics; enlightened absolutism; binary deconstruction; pragmatism

Author: Tang Guo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renc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vatang19870319@hotmail.com).

元杂剧《赵氏孤儿》于1735年经由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翻译传入法国，不仅开启了中国戏剧在海外传播的先河，同时也是儒家道德观念与西方启蒙政治哲学交汇的典型例证。伏尔泰以此为蓝本，创作了广受欢迎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 1755）。新剧在情节背景和人物塑造上与原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赵氏孤儿》中春秋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对赵家的陷害以及程婴救孤的英勇传奇，到《中国孤儿》成吉思汗征服中原、试图灭绝前朝遗孤而最终被儒家文人的品德所感化、宣布大赦的故事线，跨文化叙事在启蒙伦理思想下得到了重构和创新。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体系中，‘伦理’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所创造的世界中维持人际关系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¹。依此理论视角，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孤儿》的伦理解读，深入探析其所体现的德政、秩序、礼治等儒家元素，及其与西方“开明专制”理念的交织与对话。通过分析剧中的关键场景和人物行为，本文旨在解读戏剧作品如何映射和审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伦理思想和社会变革。19世纪德国学者威廉·罗希纳（Wilhelm Roschner）首先提出“开明专制”这一政治术语，将之定义为开明原则下的绝对主义。²这一思想观念影响了启蒙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乃该理念的捍卫者之一。尽管伏尔泰对东方道德的追求已受到学界关注³，但鲜有学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⁴的维度，解读《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特别是关于伏尔泰如何通过儒学元素来解构传统悲剧的二元对立，并推动背后“开明专制”理想发酵的讨论，尚待进一步深化。伏尔泰高度重视戏剧场域的张力，关注观众的审美体验，并强调艺术与思想的共鸣。本文立足于《中国孤儿》“文学性”与“伦理性”相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Jérôme Hélié, “L'Europe des Despotes Éclairés,” *Le XVIII^e siècle*, edited by Jérôme Hélié, Paris: Armand Colin, 2021, 255-281.

3 参见 刘艳春、赵长江：“《赵氏孤儿》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河北学刊》1（2015）：95-99；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中国翻译》4（2012）：65-69。

4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7。

辅相成的特性，探究促成该剧成功的解构技巧，同时挖掘其背后超越文本的思想意义。

一、善恶之间：戏剧人物的伦理抉择

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传统的善恶对立在人物塑造上被巧妙地解构，造就剧情的跌宕起伏、叙事的层次厚度，展示了文学描绘道德选择的复杂性。“道德选择帮助赋予人类以理性和道德意识，从而最终使他们成为具有道德性的存在”（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6）。伏尔泰通过刻画人物的道德决策，揭示了人类从伦理层面的进步。

在《赵氏孤儿》中，正面角色忠诚诚实，反面角色狡诈凶残，二者交锋尖锐，没有中间地带，体现了冲突的外在化与绝对化。在邪恶的人物范畴内，纪君祥只设置了一个消极角色：屠岸贾。此人物残暴至极，其恶行甚至从外貌上可见，足以平衡余下五个善良角色。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体系强化了元杂剧中英勇主义的效果，对恶行的谴责也愈发明显。然则，纵观《赵氏孤儿》整个剧情，反派形象虽具经典之风，但其主要作用仅在于作为与主角立场相对立的敌方力量。反派本身特质并未得以充分展现，更多时候仅作为需被击败的对象。伏尔泰认为，倘若延续《赵氏孤儿》中反派人物至恶至暴的路线发展，只能铸就英雄叙事的史诗故事范式，而真正的突破尚未形成。故此，伏尔泰创设全新“反派角色”：成吉思汗。他并非单纯作为正义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英雄”（Roubine 11）。

伏尔泰保留了善恶的基本划分，但利用儒家道德元素，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展开解构，创造了更为复杂的道德景观。他认为，元杂剧中的刚性对立难免令人陷入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情绪，反而会模糊西方悲剧中必不可少的悲怆情绪。深受法国古典悲剧“两难”法则的影响，伏尔泰强调《中国孤儿》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以赢得所有人心”（“A Monsieur le Maréchal Duc de Richelieu” 109）。因此，在人物塑造上，他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三角框架。一边是伊达美和扎姆梯夫妇，善良正直的儒家文人。一边是成吉思汗的副将奥克塔，凶狠残忍的鞑靼侵略者。这两派人物作为典型的好人和坏人，是静态的人物，性格是无任何明显变化的。支撑这两边的中间人物就是第三派人物成吉思汗，其性格立体多元，游走于善恶之间，集善战、钟情、凶狠于一身。他内心的儒家化过程象征了善恶的转换和文明的升华。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看，伏尔泰通过塑造成吉思汗这一具有多维度属性的角色，不仅是在描绘人物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在审视这些关系如何反映和质疑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和秩序。在赞美中国文明的同时，他还引出一个启蒙伦理家广泛讨论的问题：如果善是公平正义，社会良序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先进文明屡次被落后文明所征服？伏尔泰通过

扎姆梯在第一幕第一场的台词：“何用崇尚美德之光？吾辈本钟爱和平之道，立法者曾为世间楷模；法典曾引领万物之规：然皆成徒劳，智慧遭践踏；力量摧枯拉朽”（*L'Orphelin de la Chine*, 1.1, 127）¹来体现这种道德冲突和文明的挑战。

此独白直击启蒙时代部分欧洲伦理思想家持有的“道德无用论”的观点。²这一观点与以“德治”学说为核心的“道德决定论”相反，否定道德的能动教化作用。然而，伏尔泰坚信，尽管无德的势力可能暂时以武力征服有德之民，但最终也会被自身的野蛮所反噬。他借成吉思汗之角探讨了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揭示了即便是最初缺乏道德导向的人，在理解道德真谛后，也能朝着正义转变。因此善恶并非黑白对立，道德与理性也非二律背反。理性与道德之间是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影射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运行轨迹。所以，面对18世纪部分思想家对于道德进步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持有的质疑态度，伏尔泰将进一步进行反击。他通过解构“理性与道德”的二元对立，证明道德进步本质是个识智的过程。

二、理性与道德：伏尔泰视域下的君德体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成功地“挖掘了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还显著“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唐洁 杨金才 156）。这一理论方法在理解《中国孤儿》中展现的教化力量方面显示出其批评实践意义。伏尔泰在作品中强调了美德在文明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反对将理性置于道德的对立面。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维就是一种实用理性，对孔子主张的“为政以德”充满敬意。《中国孤儿》贯穿了一个核心观点：美德是可以复制与习得的。在第一幕第一场中，伊达美感叹道：“或许潜心所愿，将此猛狮于吾铁笼中致驯顺，使蛮夷适应我国风俗礼仪”（1.1, 127）。伏尔泰通过伊达美的话语提出了进一步的伦理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善政引导固步自封的帝王成吉思汗，使其免于沦为肆意践踏一切的暴君？

在伊达美的思想语境中，“美德”被视作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启蒙时代，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批判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专制统治，认为其必将导致暴力。³而伏尔泰反对这种缺乏中间环节的观念，他积极寻求一个文化缓冲地带，即“君主与道德家联盟”的开明专制。他认为，依靠道德秩序建立的君主专制乃科学理性之本，而非冲动感性。⁴这种君主就是他笔下的成吉思汗。若说《赵氏孤儿》中的人物设定存在鲜明对立，以屠岸贾等奸

1 本文有关《中国孤儿》的引用均出自 Voltaire. *L'Orphelin de la Chine*, edited by Basil Guy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2009). 以下引文仅标注幕、场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Catherine Puigelier, “La vertu n'est pas un bien, c'est un devoir (Voltaire),” *La vertu*, edited by Jean Foy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27-63.

3 参见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97-99.

4 参见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298-299.

臣的滥杀无辜和程婴等忠臣的大公无畏为例，那么在伏尔泰塑造的成吉思汗身上，这种脸谱化的绝对对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自与儒家文人相识后，原本的暴君开始陷入对自己道德责任观的困惑。他自问：“面对战争带来的痛苦，我应感骄傲抑或懊悔？”（2.4, 151）《赵氏孤儿》中单向、对立的人物类型因主角内心的道德拷问而得以解构。曾摧毁一切的成吉思汗，如今对遭受摧残的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惋惜之情，他反思道：“昔日轻视之物，皆为人类伟大智慧结晶”（2.5, 153-154）。

成吉思汗的独白显示了伏尔泰希望通过“开明君主”改革旧制度，构建符合理性社会的愿景。启蒙时期众多的哲学家、重农主义者和文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开明的改革政权，然而关于如何实现此目标，意见千差万别。对那些自居政治哲学家的人而言，理性（*raison*）是所有政治设想的基础。但“理性”只是一种带着神秘色彩的理想，并非共识性的权力理论，更非政府实践。“理性”的涵义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科学逻辑的研究并加以改良。那么推进改良的动力何在？那就是来自君主权威。法国学者路易斯·特伦纳德（Louis Trenard）指出，支持开明专制的法国哲学家主张“君主是唯一有能力将改革落实于那些愚昧、拘泥条规的民众的人”（629）。然而，君主采取的措施必须服从社会效益与法律，而服从的基石便是道德。道德不仅能够照亮君主心智，还能维系社会秩序，这种主体构建即为“理性”，而非情感、欲望与冲动。伏尔泰通过耶稣会士的著作与信件研究中国历代皇帝，认为信奉儒家道德的中国政权是令人钦佩的政治模式，体现了专制权力的优势，这是一种“能够完全遵守政府法律与基本准则的绝对权力”（Quesnay 1042）。再比如，1756年，伏尔泰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中屡次把康熙王朝的儒家社会道德描绘成维系社会理性秩序的依据。他的其他历史作品如《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51）《与凯瑟琳大帝的书信来往》（*Lettres de l'impératrice de Russie et de M. de Voltaire*, 1785）《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史》（*Histoire de l'Emp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1759）与《中国孤儿》实际上构成一个开明专制系列的闭环，突显其认同以君王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寻求绝对君主制与道德组织同构互通的社会伦理愿景。

因此，在《中国孤儿》中，原本可能走向贪鄙专横的成吉思汗，在汉朝官员的美德感染下趋于温和。这一方面符合亚里士多德（Aristote）定义的“既非善良亦非邪恶，既非纯洁无辜亦非罪不容诛”（77）的悲剧人物中间模式，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道德驯化蛮横的进步过程。本与恶人屠岸贾一样残忍疯狂的成吉思汗，反而被扎提姆刚正不阿的英气概怀所吸引，这种精神进化在成吉思汗的台词中随处可循，如第三幕第四场：“天呐！到了那时，吾心将会翻然！吾心中之警醒；正被美德所降伏，泪水所驯服；吞纳吾悲伤与羞愧之叹息！”（3.4, 172）

剧中成吉思汗的转变，反映的正是文学作品在启发道德思考、推动社

会进步方面的潜力。对于正受德化熏陶的成吉思汗而言，最大的矛盾并非来自外部因素，而是现实存在与精神内涵的对立，这也是理解“进步”理念的关键。启蒙时期的“进步”理念激起了激烈的争论。代表性的反对者，如卢梭，对“进步”概念所蕴含的乐观主义表示否定，并在《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中指出，科学、文化与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孕育了堕落，损害了自然和社会的纯朴。¹伏尔泰则是进步理念的忠实捍卫者。在《中国孤儿》的题词中，他借机讽刺卢梭的观点“野蛮原始”（*L'Orphelin de la Chine*, 117）。他坚信在理性的推动下，人类无需屈服于当前不合理的现象，也无需寻找逝去的黄金时代，而是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当下的进步。在消解了道德与理性的刻板对立后，伏尔泰转向更为深层的解构：即专制与“利他”的对立。

三、权力的调和：专制中的“利他”观念

《中国孤儿》的叙事背景以鞑靼入侵中原为历史依据，彰显了启蒙运动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揭示专制的罪行和抵制暴政。然而，在伏尔泰的作品中，他对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等所谓专制君主给予了盛赞与高度评价。一些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卢梭和伏尔泰关于王权的观念表面上看似背道而驰。然而，仔细审视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卢梭的共和主义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极端，而伏尔泰在私人信札中对彼得大帝的喜爱也没有他在《彼得大帝》中所展现的那般浓厚。因此，在《中国孤儿》中，关于成吉思汗的政治权力限度问题，伏尔泰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全盘否定，而是着重强调儒家道德在专制君主治理中的调节功能，显示了他对政治伦理问题的深层考量。

“文学的功能在于通过赞扬美德和惩罚恶行来教导道德价值观。其最终目标是回答如何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置于理性意志的控制之下的问题”（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2）。成吉思汗的转变生动的体现了理性意志如何有效的引导和塑造美德。在接触儒家思想之前，他对同情与仁慈一无所知。伊达美在第五幕第五场中感叹：“暴君的傲慢无礼一览无余”（5.5, 207）。接着，伏尔泰借助儒家元素，打破善恶二元论，探讨了与理性本身相关的道德议题。专制君主将“认知理性”转化为“实践理性”后，首先形成了诸如“明智”和“自制”等“一己德性”。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利他”的自由品质，并在社会组织中推动“道德德性”的落实。伏尔泰提倡精英治国，而精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就是在道德规范的框架内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即天下为公。这种基于职责的个人政治道德，体现为为天下人谋利的“利他”。孔子倡导以道德担当对抗权威，伏尔泰从中看到了道德对君主政治主体性的积极消

1 参见 Anne Deneys-Tunney, *Un Autre Jean-Jacques Rousseau: Le Paradoxe de la Techn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0, 39-59.

解作用，形成了开明专制的理念。统治者“利他”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源于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善良意志”。伏尔泰认为，法国君主亦应借鉴中国范本，依靠“美德”维持住法国的历史进程，使文化慧命于不绝。在第五幕第六场（终幕），成吉思汗在“专制”与“利他”之间找到了融合点，并培育了对美德真诚与纯洁的热爱：“扎姆梯：究竟何因驱使尔如此行事？成吉思汗：乃尔等之美德也。全剧终”（5.6, 213）。

伏尔泰通过细腻地描绘成吉思汗内心的伦理冲突和选择，不仅解构了“专制”与“利他”的二元对立，还展示了道德主体形成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成吉思汗的克制和思考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内心博弈突显了道德在抑制腐化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良性作用。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定位不谋而合，“‘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谢远筭 65）。伊达美和扎姆梯作为剧中的儒家官员，在客观上表达了人民对现实权威的不满，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冲突。而成吉思汗依靠德化克服了暴躁、情感冲动，这也说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构建主要依赖于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而非欲望等非理性因素。这种君王任用贤臣，贤臣优化君王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深化了《中国孤儿》中对伦理问题的探讨，也契合伏尔泰对开明专制的政治愿景。

四、文体裂变：《中国孤儿》的悲喜剧解构

自古以来，悲剧被西方文学界视为至高无上的文学形式，遵循着一套严密而规范的审美原则。以拉辛（Jean Racine）、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等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悲剧，结局往往走向死亡与毁灭。然而，《中国孤儿》打破了这一范式，展现了在不同伦理环境下文学定义的多样性。通过对戏剧中刚性二元框架的层层解构，伏尔泰创造出一个美德战胜野蛮的大团圆结局，这不仅与西方古典悲剧的传统规则不符，也引发了当时观众对于戏剧体裁内涵与外延的激烈讨论。

在分析《中国孤儿》的文体裂变，即从传统悲剧到悲喜剧的转化中，可以观察到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决策和价值观念对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的影响，以及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伦理关怀。《中国孤儿》悲喜剧界限的跨越核心，在于对主人公成吉思汗道德觉醒的描述。这不仅是故事情节上的转折，也是伦理驱动下的文体革新。依据原著《赵氏孤儿》的忠义故事，《中国孤儿》的悲剧人物原应为大义凛然的英雄扎姆梯，而悲剧行为则应为其崇高的“舍子救孤”事迹。然而，伏尔泰却将带有过失和缺陷的反派角色成吉思汗抬升至与正面角色扎姆梯相抗衡的地位，称“中国人扎姆提和鞑靼人成吉思汗是两个同样迷人的角色”（“Au duc de Richelieu” 499），同时，他还把成吉思汗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往其人生轨迹中加入“伟大”、“征服”等

喜剧因素来吸引读者的关注：“为什么每个人都读亚历山大的故事，而更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故事却找不到那么多读者呢？”（“A M. Le comte de Schouvaloff” 172）。遵循悲剧规则，主人公理应在度过重重困阻之后，仍无法抵抗来自社会的压力，最终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而《中国孤儿》整个剧情的逻辑却明显呈现出喜剧特征，讲述了君主历经内心磨砺后终于战胜困境，反映了政治的开明。

《中国孤儿》的悲喜混合特质在 18 世纪法国吸引了广泛的公众关注。首先，该剧反响强烈，1755 年首演于巴黎法国国家剧院时，场场座无虚席，门票及加座票销售一空，甚至连享有盛名的格拉菲尼夫人（Graffigny）也无票可求：“昨天我们想去看‘成吉思汗’，却无法进入剧场。观众反应强烈，甚至加演九场！”（248）两个月后，格拉菲尼夫人终于观看了此剧，并感慨万千：“我终于看到《中国孤儿》，其中有两三处让我泪流满面”（249）。《中国孤儿》虽然不符合古典悲剧的特定模式，剧情的转变不再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由逆境转为顺境，然而，它却以深刻的教诲功能打动了观众的心灵。尤其是结尾最后一句“你的美德”印证了君王克服自利的阻碍，反映了法国社会对拥有进步人性的向往。18 世纪戏剧评论家拉·莫利埃尔（La Molière）对于这种喜剧结局赞赏有加，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是何等自然！”（9）简言之，《中国孤儿》喜剧结局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关键在于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与此同时，也不乏一些剧评家批评《中国孤儿》缺乏悲剧冲突应具有不可调和性。18 世纪剧评家德斯科特（Descotes）写道：“我对《中国孤儿》持保留态度，对于成吉思汗面对汉朝儒士反抗时的“无所作为”，我持批评态度”（152）。格林（Grimm）则指责剧中人物性格模糊：“这个横扫天下的征服者在剧中性格模糊，他茫然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他凶残的同时又显得优柔寡断；他过于温和，容易被他人说服”（440）。换言之，18 世纪仍有部分观众认为，伏尔泰把冲突置于喜剧框架内的尝试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设想，一个残忍的暴君不可能“进步”成一个慈爱的君主，同时也导致该剧缺少悲剧所特有的紧张氛围。

这些反响实际上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动态下，伏尔泰作为启蒙时代第三等级代表性人物的实用主义思维。他在《中国孤儿》中的文体革新不仅挑战了传统悲剧中的固有伦理价值观，而且创造了一个既具深刻意义又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作品。他积极参与政治讨论，频繁表达了对不同制度的见解，无论是面对英国的自由政体和议会政权，还是法国莫普司法改革中的王权强化，伏尔泰始终强调道德伦理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显露出他对开明君主制这一中间政体的偏好。正是这种思维导向驱动了他在创作《中国孤儿》时对体裁的创新，其中，他通过融合儒学元素解构了西方悲剧的内部结构，展示了文学形式在伦理观念推动下的发展与进步。

在对《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进行解读时，不仅需要关注文本的表层意义，而更需探讨作品背后的道德议题。该剧之所以在18世纪法国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它所倡导的“进步”理念。然而，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本身就富有复杂性。《中国孤儿》所产生的不同观点正是反映了18世纪法国社会新旧形态交替、新旧生产方式并存时期思想的多样与驳杂。伏尔泰支持君臣等级制度，倡导哲学家为君主献策的同时，也呼吁人人平等。尽管有人质疑伏尔泰的观点无法称得上改革，然而，改革与回归之间的界限实则模糊。在改编的过程中，伏尔泰采取的解构策略并非对原作的单纯否定或破坏，而是以儒家思想从作品内部进行重新诠释和构建。这种方法不仅扩展了原作的意义层次，还将东方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展现了启蒙理念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多样性。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孤儿》在人物性格和道德决策上的深刻描写，突显了文学在探索人性深层面，挖掘道德困境及其解决方案上的独特价值。伏尔泰通过自己的作品寻求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文明结构，他的这种追求并非空想，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考量。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承认开明专制并非是对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反而是出于理论逻辑的需要。正如他所写：“假若法国人不那般法国，那我笔下的中国人将更为中国，我的成吉思汗也会更鞑靼”（“A 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580）。伏尔泰追求一种让哲学思想可以自由表达的宽松气氛，一种从上至下强有力实行德化的文明社会，一种超越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进步可能。《中国孤儿》中勾勒出的开明专制理想图景，恰恰彰显了伏尔泰非虚妄理想主义者，而是关注现实的实务主义者。

Works Cited

- Aristote. *La Poétique*, translated by Roselyne Dupont-Roc. Paris: Seuil, 1980.
- Deneys-Tunney, Anne. *Un Autre Jean-Jacques Rousseau: Le Paradoxe de la Techn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0.
- Descotes, Maurice. *Histoire de la Critique Dramatique en France*. Paris: J.-M. Place, 1980.
- Graffigny, Françoise de. *Françoise de Graffigny, Choix de Lettres*, edited by English Showalter.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1.
- Grimm, Friedrich.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Adressée à un Souverain d'Allemagne depuis 1753 jusqu'en 1769* Vol.1. Paris: Longchamps, 1813.
- Hélie, Jérôme. “L'Europe des Despotes Éclairés.” *Le XVIIIe siècle*, edited by Jérôme Hélie. Paris: Armand Colin, 2021. 255-281.
- La Molière, Cher de. *Lettre à Mme de *** sur l'Orphelin de la Chine*. Paris: Hachette Livre-BNF, 2022.
-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 [Nie Zhenzhao.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 Puigelier, Catherine. “La vertu n’est pas un bien, c’est un devoir (Voltaire).” *La vertu*, edited by Jean Foy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27-63.
- Quesnay, François.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xtes*.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2005.
- Roubine, Jean-Jacques. *Introduction aux Grandes Théories du Théâtre*. Paris: Dunod, 1998.
- Trenard, Louis. “L’Absolutisme Éclairé : le Cas Françai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38 (1979): 627-649.
- Voltaire. “A 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12 octobre 1755.” *Correspondances* IV, edited by Th. Besterman. Paris: Gallimard, 1978. 580.
- . “A M. Le Comte de Schouvaloff, 17 juillet 1758.” *Correspondances* V, edited by Th. Besterman. Paris: Gallimard, 1980. 172.
- . “Au Duc de Richelieu, 31 juillet 1755.” *Correspondances* IV, edited by Th. Besterman. Paris: Gallimard, 1978. 499.
- .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Paris: GF Flammarion, 2013.
- . *L’Orphelin de la Chine*, edited by Basil Guy.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2009.
- 刘艳春、赵长江: “《赵氏孤儿》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河北学刊》1 (2015): 95-99。
- [Liu Yanchun and Zhao Changjiang. “The Foreign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Orphan of the Chao Family.” *Hebei Academic Journal* 1 (2015): 95-99.]
- 吕世生: “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 《中国翻译》4 (2012): 67-71。
- [Lv Shisheng.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Yuan Drama ‘The Orphan of the Chao Famil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4 (2012): 65-69.]
- 唐洁、杨金才: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思想流变与道德教诲功能: 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文学跨学科研究》7 (2023): 155-161。
- [Tang Jie and Yang Jincai.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volution of Ethical Thought and the Function of Moral Teaching: A Review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7 (2023): 155-161.]
- 谢远算: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6 (2009): 703-708。
- [Xie Yuansun. “The Role of Confucian Scholar-bureaucrats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6 (2009): 703-708.]